

中国、现代性与“漫长的 19 世纪”

颜 震

[内容摘要] 《全球转型》一书聚焦 19 世纪的现代性革命,认为缔造国际关系学与当代全球秩序的力量均来自于 19 世纪。中国被迫接受西方所主导的新型权力结构与“中心—边缘”秩序,同时也主动将现代性的观念内化,成为自身发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革命席卷全球,进入到第三阶段后,体现为较为均衡的发展,引发了对世界局势的前景、民族国家的角色以及 19 世纪在世界历史中的定位的诸多疑问。中国在经历“百年屈辱”后,形成了对现代性的独特态度与视角,也对自己在全球现代性第三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挑战。

[关键词] 《全球转型》 中国 现代性

[作者简介] 颜震,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讲师

巴里·布赞与乔治·劳森是伦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两代人的杰出代表。出于对国际关系中现代性问题以及国际历史社会学理论的共同旨趣,两人在频繁的学术探索与合作中擦碰出耀眼的火花,成为《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得以面世的主要原因。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学的联姻并非新鲜事物,而把现代性革命与全球转型的主题融入到一部诠释国际关系诞生的特殊历史时段的著作,体现出两位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关怀,拥有不同寻常的厚度与启示性意义。对于中国学界来讲,这本书不仅意味着对国际关系学“史前史”的一次重要梳理与反思,还为苦于架设理论与历史之间桥梁的学者提出了重要的方法与分析工具。因此,本文将沿着两位作者开辟出的思路,围绕中国、现代性与“漫长的 19 世纪”之间的关系,进行有针对性的思考。

一、19 世纪与现代性的内化

19 世纪的历史如此重要,理所应当受到人们的重视。伴随着 19 世纪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欧洲与北美的相继爆发,跨部门的大工业生产与跨国与跨地区的商品流通将知识生产的领域进一步切分,使自然科学的门类变得更为齐全。与此同时,“进步的”意识形态试图为愈加复杂的社会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进而直接推动了众多社会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法学等学科的诞生与成熟。作为知识生产的最重要场所,19 世纪的欧洲涌现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都带有鲜明的“进步性”目标。^①

显而易见,深受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影响的国际关系学本身也诞生于“漫长的 19 世纪”的尾端,是一连串知识大爆炸链式反应的回响。而连接当今世界的全球政治—经济—军事体系也发端于 19 世纪(被称为第一效应),并衍生出第二效应的诸多行为体,如理性民族国家、跨国公司、政府间国际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② 在这里,现代性是否是社会间与全球性多元互动的结果,我们暂且不论,但在思想意识上,很多非西方人还是习惯性地把大多数现代的事物当做西方的产物,并为其赋予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色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被动地接受还是主动地参与,这种新型权力结构对依然心怀旧梦的广大亚洲和非洲等旧社会精英造成最大的冲击无疑是心理上的。其中“进步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尽管是以较为缓慢的方式在百年的历史中逐步展开。在《全球转型》的第五章,作者简要回顾了新型权力结构对中国传统秩序的颠覆性影响,但并没有将注意力聚焦于中国改革与革命的发展,而这已经被当下中国的崛起证明为 20 世纪与 21 世纪最为重要的历史伏笔之一。

中国对新型权力模式的压力感知是渐进的,也是曲折的。两次鸦片战争的

^①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98.

^② Ibid., p.2.

失败首先惊醒了王朝的统治者与社会精英,从而促使他们为了维系旧的秩序而被迫“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伴随着清王朝在中法战争与中日甲午战争的落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在内(日本)外(西方)合力之下最终崩溃。中国以及东亚的大部地区沦为“边缘”地区,而日本则成为唯一的例外,通过战争和外交的胜利加入西方所主导的“中心”地带。

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逻辑引入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中来,中国人对于社会现代性的理解杂糅了“科学”种族主义、文明的标准与民族主义等诸多元素。无论是维新变法抑或共和革命,作为舶来品的西方意识形态成为中国人自我改造思想,进而触发社会运动的最重要武器。尽管与旧思想发生激烈的交锋,但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或者凭借着托古改制,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或者秉承救亡图存的名义,较为顺利地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

随着时代的变迁,民主共和、政党政治、新文化运动、民族独立等现代性观念获得了无可争辩的合法性,甚至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所在。尽管过程更为艰难,但与日本相似,中国基本凭借自己的力量主动完成了迈向现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反思并扫除了通往现代性道路上的思想与制度性障碍。这也许是中国与日本有别于东南亚与南亚等被动接受现代性的国家的重要历史性区别。从这一点来看,不管与“中心”国家的关系是好还是坏,中国都已经将现代性内化于自身的发展道路之中,是自主而非被迫的选择,并且坚信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功得益于正确的现代化道路。以全球化的概念进入中国为例,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这一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的概念如何从被排斥到谨慎地接受,最终内化为中国自身发展理论的一部分。^①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对当前西方反全球化的现象感到不可思议。全球化很大程度上被认为等同于现代化,而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国家构建的重要目标,并且已经通过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功获得了合法性。

^① 参见 Debin Liu and Zhen Yan, “Engaging with Globalization: Chinese Perspectiv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6, Issue 11, 2015, pp. 2002 ~ 2022.

二、现代性革命是全新的阶段抑或短暂的动荡？

回首过去是为了看清通往未来的道路。尽管本书并没有系统阐释 19 世纪全球转型的历史背景,但经历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与民族国家整合的欧洲的确在 19 世纪引爆了现代性革命,积累量变为质变,最终缔造了以西方为主导的“中心—边缘”全球秩序的格局。19 世纪的现代性革命最终席卷全球,成为重塑整个世界面貌的重要原因。农业社会的缓慢与不均衡的生产力格局被打破,“中心”与“边缘”的权力不均衡格局成为世界动荡与大战的重要原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心”与“边缘”体现出动态的变化,即使在殖民时代的顶峰,其成员资格也并非固定不变。日本通过“大政奉还”将权力集中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政府,这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土耳其等传统帝国也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现代性政治道路,试图证明自身有资格跻身“文明国家”的行列。而经历十月革命的俄国则在截然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道路上疾驰,似乎偏离了“文明的标准”,并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初的时间里似乎失去了原有的成员资格,被国际联盟拒之门外。从成员资格的变化来看,各个国家与地区在通往现代性的道路上千差万别,而“中心—边缘”国际秩序成为各个版本现代性革命的最大自变量。现代性的建构力量与其破坏性的力量一样强大,而且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行为体的增加,复杂性呈现指数级的增长。这也从部分上揭示了专注于大国关系、纠结于战争与和平等宏大主题的早期国际关系研究无法预测未来,甚至难以理解现实世界的主要原因。

两位作者删繁去简,力抓主干,在第九章中将全球转型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方殖民式国际社会,持续到 1945 年。第二个阶段是西方全球性国际社会,从二战结束持续到 21 世纪的头十年。前两个阶段展示了“中心化的全球主义”。而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现代性的发展进入到了“去

中心化的全球主义”。^①在这里,作者认为全球转型仍然在进行当中,但权力模式有别于全球现代性的早期阶段,变得更加均衡且具有融合性的特征。^②这一点尤为值得深思。相对于全球转型所普遍经历过的“不均衡且融合性发展”而言,这个“人口偏少却能实力超强的时代正在远去”。^③经济全球化给新兴市场与后发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些国家能够充分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取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与技术——“非西方世界因为日益学会了利用现代实力和结构服务于自身利益而正在崛起”。^④在非西方世界普遍实现工业化的将来,新的相对均衡的发展是否会到来,世界局势是否会回到相对平缓的状态?此外,民族国家作为整合与动员资源的最重要组织力量,成为19世纪工业化的加速器,是否会在未来成为生产力升级的绊脚石?随着近期新冠病毒疫情的发展与大国竞争的加剧,有关“脱钩”的讨论体现出对全球生产链是否断裂和经济全球化是否能够维系的普遍关注。

三、中国与现代性的未来

不能否认的是,欧洲(西方)为全球现代性的早期阶段打上了深深的地缘与文化烙印,这由欧洲在19世纪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所决定。“欧洲从不曾像在19世纪一样,如此势不可挡,并被世界其他地区如此多的人奉为参照和定位的坐标。”^⑤西方所主导的现代性以坚船利炮的形象叩开了诸多封闭的国门,造成类似日本“黑船”事件的冲击性心理影响,使非西方世界普遍将现代性视为对自己身份的挑战,往往会从自身的历史文化经验出发,做出不同的反应。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文版序言中写道,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是

①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73 ~ 274.

② Ibid., p. 274.

③ [美]布兰德利·沃马克著,李晓燕、薛晓芃译:《非对称与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86页。

④ 同上。

⑤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强朝晖、刘凤译:《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中文版序第6页。

因为要面对人口过度增长、自然资源短缺、城市化发展和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等等,而最终要的就是经济全球化。面对同样的挑战,“不同国家由不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背景所决定,所作出的反应是不同的。”^①

在诠释“百年屈辱”原因的话语中,中国人通常反复强调西方“坚船利炮”和“制度优越”等优势,痛惜中国的“停滞”与“落后”,从而对西方现代性产生憧憬与憎恶相交织的纠结心态。即使在大国崛起的今天,通过历史教育与大众宣传,这种心态得到了强化,并得出诸如“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等所谓国际关系“常识”。这种心态转化为鼓励奋发图强、赶超列强的普遍共识,甚至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所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所主动参与并积极塑造的现代性议程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从国内政治、社会和文化到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全球气候治理都有所表现。可以说,今天中国的现代性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接近于“中心”地区。我们甚至可以从官方推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诸多发展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当中看到现代性重塑中国的一个缩影。

《全球转型》认为,在全球现代性的第三个阶段,意识形态的分歧已经减少,主要体现为资本主义在后冷战时代的大获全胜,几乎每个国家都按照市场逻辑来运转经济。从这一点看,这似乎是对多元现代性命题的一种质疑。或者说,该观点是对现代性发展实然的肯定,而忽略了对“进步的”应然的探讨。不管是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验,还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反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资本主义的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虽然本书给出了现代性第三阶段清晰而简明的光谱,^②但也或多或少遮掩了 21 世纪丰富多彩的意识形态与现代性细节。中国的崛起在 40 年时间里未使用暴力手段,在“中心—边缘”的体制内成功维持了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自主权,崛起为政治权力的中心之一。而在另一方面,积极介入世界产业分工的国民经济也受其约束,很

① [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中文版序言第 2 页。

②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83.

难讲已经是创新与收获红利的中心。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似乎比较符合本书中所讲的政治与经济分属不同行为领域的判断。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与落实,新的研究必将更加关注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互联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政治互信与文化认可,从而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愿景。当下,美国深陷特朗普时代的社会分裂,并已经超越了国内政治的范畴,成为全球现代性第三阶段的不确定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有中心的全球性正在走向去中心的全球性。根据本书的界定,属于中心地带的国家应该是那些全方位获取和利用现代权力格局(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的国家。^① 如此看来,未来是否还会有全面领先的国家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在著者所预言的“无超级大国”的未来中,中国的现代性革命,或者说有选择的主动现代性变革,伴随和平崛起的新范式,是否能够催生新一轮现代性的中国方案,也存有疑问。

^①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9.